

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5.09.002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许若冰.农牧交错地带“一箭之地”传说及其历史隐喻[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191-

201. 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5.09.002.

Citation Format: XU Ruobing. The legend of One Arrow's Distance in agro-pastoral transitional zones and its historical metaphors [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5(5): 191-201.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5.09.002.



# 农牧交错地带“一箭之地”传说 及其历史隐喻

许若冰<sup>a,b</sup>

(湖北大学 a. 历史文化学院; b.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要:**传说虽非信史,但蕴含着人们在特定时空下的诉求与策略及其隐含的真实历史情境。“一箭之地”分界传说在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区交界地带即中国由北至南的农牧交错地带流传甚广,治史者多以其荒谬不经,付之笑谈,实际上此传说是清代以降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人群在边疆地区的流动迁徙及与众多民族相互交融并重构空间秩序的特殊历史记忆,亦是历史时期农耕与游牧民族如何“与共”、重构彼此历史记忆的绝佳例证。虽然南北各地“一箭之地”传说版本各异,但叙事结构与母题高度契合且主要围绕两大特定历史事件,即宋辽对峙时代杨六郎在晋蒙陕甘交界地带抗击辽军与三国时代诸葛亮南征川滇民族地区展开演绎,并融入独具特色的地方性知识,逐渐成为汉蒙藏彝等各民族普遍传颂的佳话。“一箭之地”分界传说隐喻的是边地人群通过建构停战和谈、射箭定界的历史记忆,策略性地合理化当时的农牧分界与民族分布格局,这一传说的衍生与扩散既隐含着边地人群追寻和平美好生活、重构中华文化符号的朴素愿望与民间智慧,也从普通民众的视角折射出清代以来人群互动与边疆空间建构的多元面向。“一箭之地”传说所揭示的边地人群通过历史记忆建构实现社会整合与身份认同的深层机制,对于从承载民众观念的传说、神话等形式的微观记忆视角重新理解历史事件、空间建构及人群认同的联动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一箭之地;农牧交错地带;历史记忆;传说故事;民族交融

**中图分类号:**K23;I276.3;C9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5)05-0191-11

“一箭之地”分界传说在中国民间社会流传甚广,治史者多以其荒谬不经而付之笑谈,乡野坊间则口耳相传、津津乐道。随着近代以来新史学的兴起及其与人类学、社会学理论方法的互鉴,学界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代甘青川汉藏交界地带行政体制演变与民族交融研究”(24CMZ024)

**作者简介:**许若冰,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Email: ruobing1730@163.com。

逐步重新审视作为历史记忆的传说故事的史料价值及其意义,以重构并呈现经典文献之外的社会情境。陈学霖曾详细探讨蒙古“箭程划地界”习俗及其与明初北京城营建传说的关联,所谓“箭程划地界”即以箭的射程作为长度单位,或以箭的落地处划定采邑或建筑地址<sup>①</sup>。赵世瑜考察山西洪洞移民传说时也述及“一箭之地”传说和大同地区流传的杨六郎与辽国的射箭定界传说<sup>②</sup>。实际上,此类射箭定界传说还见于西南民族地区,只是故事背景由杨六郎抗辽改为诸葛亮南征,李福清、石硕、彭文斌等学者已注意及此并在各自研究中提及西南少数民族关于诸葛亮“一箭之地”传说的事例<sup>③</sup>。不过,上述研究各有侧重且聚焦于区域个案,没有从整体视野探讨南北各地“一箭之地”传说的产生、流传及其意义。

事实上,“一箭之地”传说广泛流传于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区交界地带,这一地带恰好处在中国从东北至西南的农牧交错带以及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间地带。尽管南北各地“一箭之地”传说版本各异,但其核心情节基本一致,即分属不同民族的首领A与B交战,双方和谈,A请B让“一箭之地”,B应允;A射箭极远(或暗中置箭于预定点),B叹其神勇,率族迁至箭外,此“一箭之地”即系双方重要的地理分界。民间社会对此传说的演绎主要以宋代晋蒙地区的杨六郎抗辽与三国时代诸葛亮南征川滇民族地区为背景而展开,这两个时期正好对应本地区民族关系演变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一种口述历史记忆,传说故事的产生与流传表达着人们在特定时空下的需求与愿望及其隐含的真实历史情境。换言之,传说本身即是一种真实社会情境的另类表述方式。本文并不试图从史实层面考证“一箭之地”传说的真假源流,而是将这一传说置于中国农牧交错地带及人群互动的时空背景下,探讨不同地区各个民族的传说文本及其衍生、流传的社会情境与意义,从民间文化史视角重新理解汉族与少数民族如何在交往交流中建构彼此的历史,以增进对中国农牧交错地带民族关系的整体认知。

## 一、“一箭射到大青山”:杨六郎与北方“一箭之地”传说诸文本

咸丰年间,归绥道台钟秀与幕僚张曾遍访归绥,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西北的白石头沟发现了一处箭簇遗址,其所撰《古丰识略》记曰:“六郎箭,在白石头沟内山上,长丈许,围尺,锋插石罅,摇之辄动,风雨侵蚀,木色枯朽,约数百年物也。”<sup>[2]</sup>钟秀、张曾认为此箭系“六郎箭”,而箭之由来无从实证,但他们记录了这样一则典故:“俗传宋将杨延昭镇雁门时,与契丹约,令退一箭之地,而阴使裨将孟良,取屋椽、插犁地铁刃为箭簇,置此诳之,谓从雁门关射至者,说荒诞不足信。”<sup>③</sup>按钟、张所记“俗传”即出自归化城民间传说,大体讲述的是宋将杨延昭即杨六郎镇守雁门关、令契丹人退一箭之地时,暗中派孟良以犁地铁刃为箭置此并谎称从雁门关射来。通晓典故的钟秀、张曾二人自然谓为笑谈,称其“荒诞不足信”,但此传说至少说明两点:一是至少在清咸丰年间“一箭之地”传说已在归化城民间广为流传;二是当地民众认为此“六郎箭”是宋将杨延昭自雁门关射来。

雁门关位于今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北20公里的恒山山脉南麓,这里既是从蒙古高原进入山西、河

① 以投射器物之距离作为长度单位较早见于古希腊及中古时代的斯拉夫与突厥等游牧人群。参见:(美)陈学霖《蒙古“箭程划地界”习俗考索》,《史林漫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3-8页。

② 参见:(俄)李福清著,白嗣宏译《汉族及西南少数民族传说中的诸葛亮南征》,《民族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王铭铭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9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版;石硕、邹立波《“打箭炉”:汉藏交融下的地名、传说与信仰》,《思想战线》2019年第3期;曾穷石《乡野传说中的诸葛亮与西南各族群的文明史——以“一箭之地”传说为例》(《中国民族学学会2016年学术年会暨“一带一路”视域中的民族、文化、国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026-1040页等)。

③ 咸丰十一年(1861)张曾根据《古丰识略》增补撰成《归绥识略》。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第12册《归绥识略·附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

北的战略通道,也是历代中原王朝防御游牧民族的军事屏障,长期充当宋辽对峙的前沿阵地。1947年陕西绥德革命志士延泽民途经雁门关时在当地采录到杨六郎“脚蹬雁门关,一箭射到大青山”的故事<sup>[3]</sup>;陕北民间也流传着“杨六郎真非凡,脚踩雁门拉弓弦,一箭射到大青山,摇着活络拔不下”的歌谣<sup>[4]</sup><sup>187</sup>,此处的“大青山”即在归化城北。雍正《朔平府志·归化城附》记载:“大青山,在城北二十余里,东接察罕儿界,迤北而西,直抵袄儿都司。”<sup>[5]</sup><sup>109</sup>大青山南麓便有“白石头沟”,与《古丰识略》所记“六郎箭”遗址点契合。根据当地人的讲述得以窥见“一箭之地”传说之全貌:大青山蟠龙谷坡地有一丈多长的木椽,顶端有一铁簇,人们都叫它六郎箭。传说,杨六郎镇守雁门关,宋辽议和,六郎请辽让一箭或一马之地,辽使认为一箭比一马之地便宜,便允一箭之地。杨六郎搭箭虚发一弓,对使臣说:箭已落在大青山。辽使到大青山果然发现一支箭。其实这支箭是六郎几天前派探马栽在大青山上的,这就是“头枕雁门关,脚踏草垛山,一箭射到大青山”的传说<sup>[6]</sup>。此“草垛山”系代县北与山阴县南交界的复宿山之俗称<sup>[7]</sup>,其与雁门关共同作为宋朝抵御辽军的军事要塞。此外,山西与内蒙古交界的朔州也流传着此类传说,只是地点从“草垛山”改为当地平鲁、山阴两县交界的“担子山”,至今朔州还流传着“脚蹬雁门山,手搬担子山,一箭射到大青山”的民谣<sup>[8]</sup>。

“一箭射到大青山”是否为真实史实,难以确断。不过,《续资治通鉴长编》《隆平集》《宋史》及清人所作《杨家将故事考信录》等史籍对“一箭之地”只字未提,显然此传说极大可能出自民间。清代以来,余嘉锡、常征等学者曾详细考辨宋代杨家将相关事迹,基本厘清杨延昭即杨六郎生平活动<sup>④</sup>。杨六郎长期随其父杨业驻防代州,防御地段几乎遍布雁门山全线,东起灵丘、繁峙,西抵平鲁、宁武,南至忻代盆地,北入朔县、马邑<sup>[9]</sup>,后又转战河北等地,军功卓著,素为人称道<sup>⑤</sup>。在杨六郎曾征战过的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皆有其遗迹及轶事,其中,山西忻州、河北保定和邯郸、陕西神木、宁夏固原等地仍存杨六郎祠、插箭岭、试剑石或杨家城寨等遗址,如正德《大同府志》载:“插箭岭,在广昌县城南三十里,相传宋将杨彦朗曾插箭于此,故名。”<sup>[10]</sup>顾祖禹亦记,山西广昌县之插箭岭“相传宋将杨彦朗曾插箭其上,亦曰插箭峪”<sup>[11]</sup>。清人曹颖僧《延绥揽胜》:“府谷县北九十里圪洞道,相传为杨六郎试剑石。”<sup>[12]</sup>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总之,“一箭之地”传说在山西、陕西、河北及内蒙古交界地区流传甚广,叙事母题基本一致,那么,各地射箭传说的落点为何共同指向大青山?

事实上,历史上的大青山长期横亘于游牧与农耕人群之间,构成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重要的过渡带与地理中介。翦伯赞曾述及大青山的地理意义:大青山是一条并不很高但很宽阔的山脉,这条山脉像一道墙壁把集宁以西的内蒙古分成两边。山的北边是暴露在寒冷的北风之中的起伏不大的波状高原,山的南边则是在阴山屏障之下的一个狭长的平原<sup>[13]</sup><sup>141</sup>。作为阴山山脉中段的主体部分,大青山山脉从东北向西南延伸,恰好将蒙古地区分为南北两部,北部为广阔无垠的蒙古高原即草原部族的游牧区,而南部为沃野千里的河套平原,紧邻晋陕山地,属于传统农作区。由此,阴山及大青山南北两侧呈现完全不同的地理景观与经济活动,构成游牧与农耕的地理与文化分界带。

大青山及其南麓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使其成为深受历代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青睐的重要枢纽与必争之地,阴山以南的沃野更成为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跳板。特别是阴山及大青山山脉存在诸多连通南北的峪口,如大青山“北有数口,皆通大漠,高数十仞,广三百余里,袤一百余里”<sup>[5]</sup><sup>109</sup>,这些峪口散布着堡垒遗址,成为游牧与农耕人群之间的重要通道。诚如翦伯赞所指:“汉族

④ 参见: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常征《杨家将史事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页。

⑤ 欧阳修赞誉杨业、杨延昭“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参见:《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欧阳修集编年笺注》第2册,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469页)。



如果要排除从西北方面袭来的游牧民族的威胁,也必须守住阴山的峪口。”<sup>[13]</sup><sup>142</sup>由此观之,大青山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抵御游牧人群南下、护佑中原的屏障,其对于河套平原、黄土高原及华北平原农耕人群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这意味着大青山实际上成为农耕与游牧民族分界的地理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一箭之地”传说还流传于甘肃的河西、甘南、陇南,以及辽东等地。如嘉峪关外黑山湖附近戈壁滩上砂石岗崖的箭痕,传说是宋代佘太君孙女杨金花征西至金城关,令小国退一箭之地的遗迹,当地也传诵着“足踏黄河沿,一箭射到嘉峪关”的故事,其叙事结构与杨六郎射箭传说基本一致<sup>[14]</sup>。而嘉峪关恰好是明至清前期汉人定居屯垦的最西界,充当着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地理分界,越过嘉峪关便进入“西域”。此外,甘南舟曲县狼岔峪石崖嵌着的箭头,当地人传说:蕃族首领格萨尔与汉族首领黑胡子杨大人射箭定胜负,杨大人从武都关一箭射到狼岔峪石崖,格萨尔王十分佩服。两人重定界线,最终以武都关为界,以西为蕃地,以东为汉地。蕃汉自此守约,和平共处。民间认为“黑胡子杨大人”系杨六郎,有学者考证“黑胡子杨大人”实系南北朝仇池氏王杨难当,该传说的原型是氏、羌的军事冲突与势力划分,最终演变为汉、番两族地理分界的依据<sup>[15]</sup>。此外,在辽东地区传说唐朝大将薛仁贵与高句丽将领渊盖苏文约定射箭定界,薛仁贵一箭射穿凤凰山后落至鸭绿江,两国遂以江为界,此即当地流传甚广的“神弓射箭眼,一箭定辽东”的传说<sup>[16]</sup>。以上传说虽未有预先藏箭的情节,但射箭定界似乎不约而同地成为各民族分界的主要依据与共同选择,这一点还体现在川甘交界“白马藏族”的迁徙传说中,只是射箭者改为孔明。相传白马人曾在绵阳一带与汉族杂居,孔明要白马人让一箭之地。箭射出后,白马人翻过一山又一山,一直找到深山老林。原来孔明早派人把箭插到这老林子。白马人守信用,迁到现在的平武县城一带<sup>[17]</sup>。此传说的母题与杨六郎如出一辙,“白马藏族”生活在平武县、文县崇山峻岭之间,一般认为白马人系氏族后裔,不能排除部分白马人祖先迁自成都平原的可能性,由此白马人将孔明射箭作为其族群迁徙依据的缘由。孔明“一箭之地”传说也在川滇藏缅语人群中流传甚广。

## 二、文化英雄:川滇藏彝民族走廊上的诸葛神箭传说

民国十三年(1924)盛夏午夜,打箭炉藏人“智慧保罗”一如往常地来到英国驻打箭炉领事孔贝(G. A. Combe)家中聊天,述说自己长期游历川藏各地之见闻,特别是在提及打箭炉的汉人时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

在经过几番艰苦较量之后,孔明把这些蛮人赶出了崇州地区。为了使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作为一个足智多谋的将军,他订出和平的条件,即他射出一支箭,箭射到哪里,蕃(Bod)人就要把这块地盘割让给他。这些蕃人同意了,孔明于是拉弓搭箭,那弓十分有力,射出的箭远远地向西边飞去,在场众人都不知它落到何处。最后,几经搜寻,终于在萨木扎格山(Dsamdrag)找到了它,而萨木扎格山可以俯瞰其北方的打箭炉。原来是孔明的密使偷偷地把箭插到那儿的。藏人以为孔明一定是个无所不能的神仙,他们只得遵守承诺,把崇州到萨木扎格山的所有地区都让给了孔明。<sup>[18]</sup><sup>115-116</sup>

从“智慧保罗”的讲述中,孔明在与“蕃人”(藏人)的战争中采取射箭定界的方式消弭战事,但“蕃人”并不知晓,孔明已提前将箭藏于打箭炉南的“萨木扎格山”,遂将打箭炉以东让予孔明。事实上,这些记载并不见《三国志》及后世正史册籍,而是被孔贝记录于《藏人言藏》,邓小咏译及这则故事时也注称:“以上关于诸葛亮的一些说话,大都是传闻不实之词。”故事的讲述者“智慧保罗”系四川甘孜州藏人多杰卓巴(Dorje zodba),汉名“谢国安”,长期游历川藏各地,兼通汉、藏、梵及英语,定

居打箭炉期间与英国驻打箭炉领事孔贝交往甚密<sup>[18]</sup><sup>195</sup>。这则故事很可能是“智慧保罗”在打箭炉生活期间采自民间的传说轶事,这一点可以从民国西康知识精英冯有志《西康史拾遗》得到佐证:

诸葛亮时为汉相,为保成都安全,请藏军西退一箭之地,藏军认为一箭射及之地,并无多少,遂允其请,约期射箭。但诸葛亮却密遣部将郭达,先到炉城,造一铁箭安置在东面山顶。到期射箭后双方派人寻箭,直寻至打箭炉东郊山顶,才将箭寻获,于是川藏双方,遂以打箭炉分界。事后郭达恐藏方知其弄虚作假,加害于他,遂扑入锻铁炉内,自焚而死,后人嘉其行,在打箭炉北关内,立庙祀之,名曰将军庙,庙内郭达塑像,满脸火泡,说者谓系当年郭达扑炉自杀时所留疤痕。并将当年安箭之山,命名为“郭达山”……此二说虽近乎神话,但仍为人乐道不置。<sup>[19]</sup>

作为打箭炉本地人的冯有志对此传说更为熟稔,其描述的叙事结构与“智慧保罗”高度相似并融入了郭达将军的奇闻轶事,特别是明确指出诸葛亮暗中派遣郭达至打箭炉造铁箭置此,最终双方以打箭炉分界。“打箭炉”又称“打煎炉”“打折卢”,即今四川大渡河西岸甘孜州首府康定市。关于其得名之由来,康熙四十年(1701)《圣祖仁皇帝御制泸定桥碑记》载:“打箭炉未详所始,蜀人传汉诸葛武侯亮铸军器于此,故名。”<sup>[20]</sup><sup>133</sup>乾隆年间周霭联《西藏纪游》亦载:“昔武侯征孟获时,令麾下将郭达于沙哇纳安炉造箭,故名。今山上尚有炉鞴故址。城中有郭将军庙,甚著灵异。”<sup>[21]</sup>有学者认为,“打箭炉”实际上是藏语“dar rtse mdo”之译音,其因诸葛亮派郭达将军造箭于此而得名,均为蜀人的主观建构,是望文生义的传说<sup>[22]</sup>。而“郭达”实系当地藏族祭祀的山神“噶达”(mgar ba),“噶达”神山又称“郭达山”,康定民间流传的《郭达山的传说》与“智慧保罗”、冯有志所述基本一致<sup>[23]</sup>。

尽管诸葛亮、郭达及“一箭之地”传说系当地人的主观建构,但打箭炉也确实处在汉藏两大民族及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分界带,只是这一民族及农牧格局的定型,要晚至康熙年间打箭炉汉藏贸易市场成熟以后,这暗示“一箭之地”传说很可能是在此背景下生成的。明中叶以降,随着明朝经营西藏的重心渐由西北转向西南并将途经打箭炉的川藏道作为联结内地与西藏的主要通道,打箭炉逐渐成为汉藏贸易的集散地。乾隆《雅州府志》记:“自明末流寇之变,商民避兵过河,携茶贸易,而乌斯藏亦适有喇嘛到炉,彼此交易,汉番杂处。”<sup>[24]</sup>不过,康熙以前清廷尚未完全控制打箭炉,直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西炉之役”后才实现对打箭炉的管控,大批汉人官兵、商人、垦民及各类工匠纷纷涌入,特别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横跨大渡河两岸的泸定铁桥建成后“邮传之络绎,军民商贾之车徒负载,咸得安驱疾驰”<sup>[20]</sup><sup>133</sup>,打箭炉日益成为中央政府经略藏地及汉藏民族经济贸易的核心枢纽。

从地理空间而言,打箭炉位于青藏高原南缘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越过打箭炉西部的折多山便来到塔公草原,进入以藏族为主体的游牧区,打箭炉以东则属于传统的山地、平原农耕区。清中后期东部农区的汉回民众与西部牧区的藏族同胞汇聚打箭炉,使其成为汉藏之间的地理与心理分界。这意味着“一箭之地”传说很可能是康熙以后汉人大量涌入川西及打箭炉并与当地藏人大规模密切接触后产生的历史记忆。彭文斌也认为诸葛亮、郭达“射箭/造箭”的故事与汉族移民源源不断地融入打箭炉有关<sup>[25]</sup>。石硕进一步指出“诸葛亮”是一个寓意极强的汉人符号,打箭炉的汉人多来自蜀地,而蜀地民间对诸葛亮“征南中”等事迹与传说十分熟悉。这些背景均是促成汉人移民塑造“打箭炉”地名并附会与之相应的诸葛亮“退一箭之地”传说的缘由<sup>[26]</sup>。

事实上,“一箭之地”传说在西南地区流传甚广,特别是在川滇接壤的大小凉山彝族社会口耳相传,故事演绎更为丰富,但射箭落点共同指向大凉山。位于大凉山北麓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有地名曰射箭坪,“相传孔明到此作战,双方议定以一箭之地为准,而一箭射出后即落此坪上,故名”<sup>[27]</sup>。

据当地人讲述,三国之前彝族遍布四川,诸葛亮七擒孟获,希望其退一箭之地。与前述故事不同的是,彝族传说是由孟获射箭,诸葛亮授意赵云将射出的箭,插在大堡镇双溪村,孟获至此才找到箭,以为是神的意思,便把族人迁走并立碑为界<sup>[28]</sup>。此“大堡镇”古称“平夷堡”概因历史上汉彝交战而得名,恰位于大凉山北麓的彝、汉民族交汇地带。而重庆巴南区也传有诸葛亮与孟获在泸水打仗、射箭至大凉山的故事,其中还加入诸葛亮请土地菩萨将箭插到大凉山的情节,孟获遂退至大凉山,所以大凉山又叫“一箭之地”<sup>[29]</sup>。此外,在大凉山北麓与成都平原过渡地带的犍为、沐川、马边三县,特别是马边彝族中传说诸葛亮在犍为首败彝军后,令其退一箭之地,彝族首领寻诸葛亮射出的箭直至马边雪口山的崖壁上,惊叹汉军如有神助,于是退至雪口山以内大小凉山<sup>[30]</sup>。而云南昭通彝族的古老传说《海夸》则描述了诸葛亮令陇土府大将海夸“让一箭之地”,由海夸箭射过金沙江落在凉山,从此陇土府就退到大凉山<sup>[31]</sup>。昭通也恰好处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大凉山与乌蒙山之间的过渡地带。

大凉山南麓云南境内的保山、大理、普洱等地亦有不少诸葛遗迹及轶事。民国年间,江应樑曾亲至永昌府即保山、永平一带考察,并在《诸葛武侯与南蛮》中记叙了保山城南诸葛营村一处名为“神箭墩”的遗址:

诸葛营村前田中有土墩,高四五尺,广约三方丈,村人呼为神箭墩。相传武侯大军未至永昌时,此间驻有大部蛮兵,武侯兵至官坡岭,遥见此间蛮兵众多,即施巧计,用木削成大箭杆,以犁作箭头,使人潜入蛮寨,将箭头埋入墩内,平明,蛮兵见之,皆大惊曰:官坡岭距此五十里,孔明一箭即射至此墩上,吾辈不可居矣!即相率退去。武侯始率大军进驻其地。<sup>[32]</sup>

此处虽未出现孔明射箭的桥段,但其略施巧计以犁作箭埋入寨内便攻克蛮寨,实与“一箭之地”密切关联。结合前述杨六郎在大青山“取屋椽插犁地铁刃为箭簇”的传说,以犁作箭实际上隐喻的是汉地农耕生产技术的传入,而保山流传的“诸葛神箭”故事与“一箭之地”传说母题一致<sup>[33]</sup>。此外,云南大理鹤庆县纳西族流传着孔明智取黄坪坝的故事,传说孔明带兵到鹤庆县,想把随军家小留在黄坪种田。为此备厚礼与孟获部下蛮兵格葺、木旺两头目见面,借“一箭之地”。格葺、木旺生性耿直,写下凭约:“借一箭之屯田,一箭之内地盘由蜀军管辖,箭外地盘由孟军驻守。”次日,孔明与格葺等见证赵云在白马厂山顶射箭,向北飞去。格葺等人一直追到金沙江边在丽江石鼓渡口才发现这支箭,格葺和木旺只好驻守到“箭外”地方。其实孔明提早造了两支同样的箭,一支交给赵云,另一支由亲信连夜钉在石鼓渡口的鼓石上。孔明不但得了黄坪坝,北衙、鹤庆坝也成了他的地盘<sup>[34]</sup>。此说流传于大理北部的鹤庆、宾川至丽江一带。而普洱佤族则传说孔明率军至普洱,与佤族头人喝酒为盟,让一箭之地。诸葛亮一箭射中阿佤山顶峰莱姆山。佤族头人惊呆了,整个阿佤山到处响起铜鼓声,欢迎诸葛亮进山,从此莱姆山改称孔明山<sup>[35]</sup>。

需要指出的是,“一箭之地”只是西南少数民族关于诸葛亮传说的一个类型,云南民间流传的“三箭定鸡足山”“拔剑斩懒龙”、勐腊傣族“泼水节”、傈僳族“火把节”等均与诸葛亮有所关联<sup>⑥</sup>。这些传说在融入本民族地方性知识外,还共同将诸葛亮描绘为机智、聪慧的文化英雄,正如李福清所言,西南少数民族描绘自己祖先同诸葛亮的战斗,“把诸葛亮表现为一个智慧过人的战略家,他与其说是战胜对手,不如说是努力防止战争和向少数民族灌输文明的战略家”<sup>[36]</sup>。

⑥ 参见:《中国民间故事丛书·云南大理·宾川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3页;傅光宇《诸葛亮南征传说及其在缅甸的流播》,《民族艺术研究》1995年第5期,第20-22页。



### 三、没有硝烟的战争：“一箭之地”传说的社会情境及历史隐喻

“一箭之地”传说广泛流传于蒙古高原南部并向西南延伸至青藏高原东部的半月形地带,特别是汉族以外的藏族、蒙古族、满族、彝族、纳西族、佤族、白马人等少数民族颇为笃信,对当地民众而言,射箭分界传说并非笑谈,而是他们接受并相信的“事实”,进而形成相对固定的叙述模式。此中实际上隐含着边地人群在特定时空情境下形成的有关社会认同与区分的“历史心性”并遵循一固定模式去回忆与建构“历史”<sup>[37]</sup>。

20世纪80年代,童恩正考察史前细石器、石棺葬等遗迹时提出“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一宏大命题并指出“当我们探讨这一边地半月形地带内呈现某种文化同一性的原因时,首先应当考虑的,就是其生态环境”<sup>[38]</sup>,这一点也有助于从自然地理空间下理解孕育“一箭之地”传说的客观环境。实际上,射箭分界传说广泛流传的晋陕蒙及甘川滇交界区恰好同处在高原与平原山地之间的地理过渡与连接地带。首先,晋陕蒙交界地带处于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太行山脉之间,作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长期接触交流的重要区域,历史上来自大兴安岭或蒙古高原的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部族持续向这一地带汇聚。进入清代,来自晋陕冀的汉回民众大规模北上,迁居于此,使其成为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密切交汇区。其次,甘川滇交界地带既是青藏高原同云贵高原、成都平原的连接带,也是藏族与西南众多民族交流交融的关键区域,历史上藏缅语民族自北向南迁徙,百越及汉族自东向西流动共同汇集于此,使其成为汉族及北方民族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连接地带<sup>[39]</sup>。总的来看,晋陕蒙及甘川滇交界地带都是内地农耕与高原游牧人群相互接触、交往交流的重要通道,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交汇和交错杂居的区域,在连接汉蒙藏彝民族及内地与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社会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与枢纽作用。这是“一箭之地”传说生成的地理与民族基础。

地理过渡地带与民族交汇带的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晋陕蒙及甘川滇交界地带成为历史上各民族政权交战的前沿阵地,由此遗留了诸多古箭簇、城堡及战场遗址。箭是古代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共有的生产技术与作战工具,广泛应用于捕猎及战争活动,作为主战场的大青山、嘉峪关、打箭炉等地便遗存大量箭簇遗址。而宋辽对峙时期晋陕蒙地区的杨六郎抗辽与三国时代诸葛亮南征川滇民族地区,这两大决定区域民族关系发展格局与走向的重大事件无疑为当地各族民众想象彼此、重构历史提供了创作素材与想象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云南保山诸葛亮“以犁作箭”与杨六郎在大青山“取屋椽插犁地铁刃为箭簇”实际上隐喻的是农耕生产技术的传入。由此便可理解杨六郎与诸葛亮射箭的落点为何在大青山、嘉峪关、打箭炉、大凉山等农牧及民族分界线。

尽管“一箭之地”传说假托三国及宋辽战事,难以溯其原型,但其流传时代主要在清代民国至今,表明此传说很可能是清代汉人大规模移居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交往交流后的主观建构与附会。那么,汉人移民为何要建构这一传说?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社会历史情境?

前已述及,“一箭之地”传说广为流传的晋陕蒙及川滇地区同处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汇地带。随着清前中期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北部及西部边疆趋于稳定,在清朝政府的组织下沿边省份的汉族移民持续向蒙古高原南部及青藏高原东部迁徙定居,由此在长城沿线与川藏道上演绎着“走西口”“走口外”“走藏边”的动人故事。最终在青藏高原东缘及蒙古高原南缘形成了诸多以汉族为主或汉族与少数民族聚居的城镇与村落,如归化城、绥远城、包头、打箭炉等。石硕、邹立波在论及打箭炉传说时曾指出,对汉人移民而言,“一箭之地”传说强调和隐喻了一个事实:打箭炉并非“异乡”,早在

诸葛亮时代就已是汉人的地界,这在一定程度上排解和疏导汉人因客居异域而产生的心理症结和不适感<sup>[26]</sup>,此乃洞见,亦有助于理解六郎射箭传说。

在宋辽对峙时期,杨家将长期活跃在晋陕冀地区抗击辽军,因其忠勇事迹而广为人知,家喻户晓。清中后期山西、陕西及河北移民持续北上至内蒙古阴山暨大青山一带开展大规模垦殖活动,开辟新家园。面对当地大量由蒙古王公占有的牧场,这些移民通过租佃、买卖等方式将牧地开垦为田地,逐渐完成从“雁行”到定居的过渡,由此在晋陕蒙交界的平原、河谷地带形成诸多蒙汉聚居村落,进一步推动蒙汉民族社会经济与文化交流及深度融合。翦伯赞便指出:“阴山一带在民族关系紧张的时期是一个战场,而在民族关系缓和时期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的驿站。”<sup>[13]146</sup>清代正值蒙汉关系缓和并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一箭之地”传说所表达的内核便是通过和谈与射箭的方式划分界线,反映了当地人群渴望消弭战事与和平生活的愿望与诉求。特别是迁居异乡的汉族移民对塞北蒙地的生活环境与风土人情颇感陌生且较多疏离与隔膜,这无疑会增加汉族移民们的心理不适感与“思乡”之情,杨六郎抗辽“一箭射到大青山”并以此为界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开垦定居获得心理优势与话语权。由此,作为抗击游牧人群的主力战将,杨六郎在清代晋陕移民北上过程中被重新唤出历史舞台,成为他们应对游牧民族的一面旗帜。

当然,射箭定界传说并非只是汉族的单方面建构,当地少数民族也在接受过程中进行修改、借用并融入地方性知识,“一箭之地”传说因之呈现本土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复杂形态。这一点在打箭炉“郭达造箭”故事中尤为明显,所谓“郭达”实际上源自当地藏族群众祭祀的山神“噶达”(mgar ba)<sup>[22]</sup>,“噶达”这一本土神祇在“一箭之地”传说中改头换面为协助诸葛亮智取打箭炉的重要将领。此外,呼和浩特的满族则进一步引申满族英雄巴图鲁曾拔下六郎神箭在大青山射杀老青龙的故事<sup>[40]</sup>,而彝族、藏族、白马人关于射箭地点都加入本地的重要地理标识,特别是回族关于杨六郎的射箭传说是“以六郎的箭为界,箭北是蒙族的地盘,箭西为回族的地方,箭东南是大宋的江山”<sup>[4]187</sup>,此观念应是在近代回族意识觉醒背景下产生的。各民族均在“一箭之地”传说中融入本土特色的人物轶事与叙事倾向,又蕴含着当地少数民族怎样的意图与观念?

彭文斌认为西南少数民族的诸葛亮“射箭”故事是诸葛亮为获取原住民空间而采取的欺骗性策略(deceptive strategy),并指出这一传说与汉人移民努力重塑象征秩序以证明他们的闯入和生存是合理的有关<sup>[25]</sup>。但实际上,在蒙藏彝诸民族传说中并未表达对诸葛亮、杨六郎的不满或将其描述为狡猾、欺诈等负面形象。相反,众多民族将诸葛亮赞颂为“无所不能的神仙”“足智多谋的将军”等,特别是基诺族、佤族等甚至将祖源与诸葛亮联系起来。如云南景洪基诺族祖先传说中,孔明向云南王要“一弓之地”,国王同意,孔明箭射到基诺山,国王派人找箭,有的人在山上睡着了,以后这些人就在基诺山生活,没有回孔明的队伍<sup>[41]</sup>。而傈僳族、景颇族、德昂族等更将诸葛亮奉为传播文化的神明。如德昌傈僳族传说,诸葛亮南征时塑造的高大泥人变成活人,诸葛亮封他们为“泥塑族”。他们穿草衣、打野兽,作战勇猛,称汉兵为兄弟,后来留在山上,“泥塑”被写成“傈傈”即傈僳族<sup>[42]</sup>。在德昂族传说中,诸葛亮教德昂族姑娘阿娑织衣、耕地和天文地理知识并产生情愫<sup>[43]</sup>。事实上,西南少数民族传说中最突出的一个共同点是诸葛亮富有智慧,“给少数民族带来先进技术和文化,推动生产、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可亲近的人物”<sup>[44]</sup>,同时通过重构诸葛亮的传说故事将自身历史融入王朝大历史的叙事之中。

总之,“一箭之地”传说的流传区域是中国历史上人群流动最密集、战争活动最频繁的地带,对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无疑是当地汉族及少数民族的愿望与需求。“一箭之地”传说虽以交战为背景,



实际上所表达的内核是停战和谈,以射箭方式划定界线并以此解释当下的民族分布格局,而清中后期以降,晋陕蒙及甘川滇交界地带形成的农牧分界及民族分布格局,则构成“一箭之地”传说产生并呈现同类叙事模式的重要地理与社会情境。

## 结语

“一箭之地”传说的产生与流传是在特定时空情境下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双向互动、共同建构的特殊历史记忆,蕴含着各民族对和平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与诉求。基于对南北各地“一箭之地”传说文本的初步解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一箭之地”传说广泛流传在中国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四川、云南等沿边省区交界地带,恰好与中国自北至南农牧交错地带以及“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相吻合。实际上,这一地带共同处在高原与平原山地之间的地理过渡带以及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交融的民族交汇带,特别是射箭落点的大青山、打箭炉、大凉山即处在高原游牧与内地农耕民族的地理分界点。这种地理过渡带与民族交汇带的特质构成“一箭之地”传说衍生与流传的地理与民族背景,而各民族的交往交汇及其对和平生活的主观需求与战乱频发的现实则是传说背后隐含的真实社会情境。

第二,“一箭之地”传说在清代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人群向边疆地区流动迁徙及其与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背景下产生,当地少数民族则在接受过程中加以修改、借用并融入地方性知识,最终促使射箭定界传说成为各民族普遍传颂的佳话。随着清中后期晋陕甘川滇沿边汉族移民向边疆地带迁徙定居,杨六郎抗辽与诸葛亮南征的故事实际上为这些移民的合法开垦与入驻提供了历史依据与话语权,同时也使他们在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交流中获得一定的心理优势与心灵慰藉。而各少数民族则借助“一箭之地”传说将自身历史及本土知识融入王朝大历史的叙述之下,主动参与以杨六郎、诸葛亮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符号的重构与传播,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共有、共享的记忆与符号。正如石硕所言,主体人群同边疆人群交往必然需要“与共”,人们往往选择和利用传说来创造彼此的关联性,创造共同历史记忆、共同文化及共同符号<sup>[22]</sup>。“一箭之地”传说恰好提供了农耕与游牧民族如何“与共”、重构彼此历史的绝佳例证。

第三,“一箭之地”传说隐喻的是通过建构停战和谈、射箭定界的历史记忆,策略性地合理化当时的民族格局与农牧分界状况。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而言,南北“一箭之地”传说虽以宋代杨六郎抗辽与诸葛亮南征为背景展开演绎,暗含着民族交往中的矛盾与张力,但以停战和谈方式解决争端无疑是此传说的最终指向。从此意义而言,“一箭之地”传说无疑从普通民众的视角揭示出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朴素愿望与民间智慧。

总之,“一箭之地”传说所表达的边地人群对边疆空间秩序与身份认同的认知,提示我们需要从民间文化的视角,特别是承载普通民众观念的传说、神话等形式的微观记忆层面重新理解历史事件、空间建构及人群认同的联动关系及其意义,进而在更大的地理空间与视野下考察中国农牧交错地带的文化共性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塑机制问题。

(本文写作中得益于石硕、赵世瑜、周宏伟、施恬逸等老师的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 参考文献:

- [1] 赵世瑜. 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J]. 历史研究, 2006(1): 49-64, 190-191.
- [2] 钟秀, 张曾. 古丰识略: 卷8[M]. 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民国二十七年抄本: 8b.

- [3] 延泽民. 延泽民文集:第8卷[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133.
- [4] 丁工. 陕北览胜[M]. 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89.
- [5] 雍正朔平府志:卷3[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 [6] 呼和浩特市群众艺术馆. 青城的传说[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163.
- [7] 乾隆大同府志:卷4[M]//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4辑.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85-86.
- [8] 郭延生. 杨家将传说调查报告(下)[M]. 北京:群言出版社,2018:425.
- [9] 常征. 杨家将史事考[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159.
- [10] 大同府志:卷1[M]. 正德十年刻本:18b.
- [11] 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M]. 贺次君,施和金,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5:2048.
- [12] 曹颖僧. 延绥揽胜(下)[M]. 重庆:史学书局,1945:14.
- [13] 翦伯赞. 内蒙访古[M]//江山多娇:游记选集. 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
- [14]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甘肃卷编辑委员会.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甘肃卷[M]. 中国ISBN中心,2001:68.
- [15] 杨巧英. 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历史上舟曲“狼岔峪断箭传说”的层累建构为例[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3):40-49,241.
- [16] 潘士君. 辽宁风物与民俗文化选编[M].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6:12-13.
- [17]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四川分会,四川大学中文系. 四川白马藏族民间文学资料集[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2:119.
- [18] 孔贝. 藏人言藏:孔贝康藏闻见录[M]. 邓小咏,译.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 [19] 冯有志. 西康史拾遗[M]. 成都:巴蜀书社,2015:3-4.
- [20] 《西藏研究》编辑部. 卫藏通志[M].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 [21] 周霭联. 西藏纪游:卷2[M]. 张江华,李垣垣,点校.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44.
- [22] 石硕. 传说与历史记忆:主体人群与边疆人群如何“与共”:从“庄蹻王滇”和“打箭炉”说起[J]. 西北民族研究,2023(3):5-13.
- [23] 甘孜州文化局. 康定的传说[M]. 康定:甘孜州泸定县印刷厂,1999:10-11.
- [24] 乾隆雅州府志:卷10[M]. 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249.
- [25] PENG Wenbin. Ethnic Memory and Space: Legends of Zhuge Liang on Sino-Tibetan Frontiers[M]//王铭铭. 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9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 [26] 石硕,邹立波. “打箭炉”:汉藏交融下的地名、传说与信仰[J]. 思想战线,2019(3):33-45.
- [27] 峨眉县地名领导小组. 四川省峨眉县地名录[M]. 峨眉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1982:139.
- [28] 峨边彝族自治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峨边札记[M]. 成都:四川金邦印务有限公司,2019:27.
- [29]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重庆市卷编纂委员会.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重庆市卷上[M].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772-773.
- [30] 刘忠福. 远去的辙痕:乐山交通文史掌故与传说[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284.
- [31] 昭通地区民委,文化局. 昭通地区民族民间文学资料选(第2集)[M]. 昭通地区文化局、民委编印,1985:4.
- [32] 江应樑. 西南边疆民族论丛[M]. 广州:珠海大学出版社,1948:258-259.
- [33] 保山市文化志编纂委员会. 保山市文化志[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454.
- [34] 罗杨. 中国民间故事丛书·云南大理鹤庆卷[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127-128.
- [35] 尚仲豪. 佤族民间故事集成[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2.
- [36] 李福清,白嗣宏. 汉族及西南少数民族传说中的诸葛亮南征[J]. 民族文学研究,1992(2):85-94.
- [37] 王明珂. 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 历史研究,2001(5):136-147,191.
- [38] 童恩正. 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C]//文物出版社编辑部. 文物与考古论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32.
- [39] 石硕. 多民族相处之道:藏彝走廊民族交往的经验与智慧[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7-64.
- [40] 佟靖仁. 呼和浩特满族民间故事选[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126-130.
- [41] 王士媛. 中华民族故事大系:第16卷[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809-810.

[42] 凉山州集成编委会. 凉山民间文学集成(下)·故事卷[M].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164.

[43] 《思想战线》编辑部. 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M].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292.

[44] 傅光宇. 诸葛亮南征传说及其在缅甸的流播[J]. 民族艺术研究,1995(5):16-24.

## The legend of One Arrow's Distance in agro-pastoral transitional zones and its historical metaphors

XU Ruobing<sup>a,b</sup>

(*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b.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P. R. China*)

**Abstract:** While legends are not credible history, they encapsulate the aspirations and strategies of people within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s along with the implied authentic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The boundary demarcation legend of One Arrow's Distance has been widely circulated across China's northern-southern agro-pastoral transitional zones, particularly in border areas between Inner Mongolia, Hebei, Shanxi, Shaanxi, Gansu,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s. Though often dismissed by historians as absurd anecdotes, this legend in fact embodies a distinctive historical memory reflecting the migration patterns of predominantly Han agricultural population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ir spatial order reconstruction through ethnic integration in frontier regions. It also serves as a compelling case study demonstrating how farming and nomadic groups historically negotiated coexistence and mutually reshaped their collective memories. Although versions of the One Arrow's Distance legend vary across northern and southern regions, their narrative structures and core motifs remain strikingly consistent. These tales predominantly revolve around two pivotal historical events: Yang Liulang's resistance against the Liao forces during the Song-Liao confrontation era at the junction of Shanxi, Inner Mongolia, Shaanxi, and Gansu, and Zhuge Liang's southern expedition to ethnic regions of Sichuan and Yunnan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Through the incorporation of distinctive localized knowledge, the legend has evolved into a collectively celebrated narrative among Han, Mongolian, Tibetan, Yi,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The One Arrow's Distance boundary legend metaphorically represents how borderland communities strategically rationalized contemporary agricultural-pastoral boundaries and ethnic distribution patterns through constructing historical memories of ceasefire negotiations and arrow-shot demarcation. The deri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is legend not only embody border populations' grassroots aspirations for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their folk wisdom in reconfiguring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but also reflect multiple dimensions of human interactions and frontier spatial construction since the Qing dynasty from a grassroots perspective. The deep mechanism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identity formation through historical memory construction, as revealed by this legend, offers significant insights for reinterpreting historical events, spatial configurations, and group identity dynamics through the microcosmic lens of collective memory embedded in folk narratives and myths that carry popular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One Arrow's Distance; agro-pastoral transitional zones; historical memory; legendary narratives; ethnic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 周 沫)